

“混合所有制经济”概念的形成、发展及其核心内涵

冷兆松

[摘要] 历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30多年一脉相承的接力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理论和政策逐步形成,并不断发展和完善。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财产混合所有的经济单位”新概念,为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取向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政策创新开辟了空间。1997年,十五大报告提出“混合所有制经济”新概念。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展、完善和创新了“混合所有制经济”概念,揭示其核心内涵和国企混改的方向。2015年,《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国企混改的目标。

[关键词] 混合所有制经济;形成;发展;内涵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273(2015)09-0001-04

1979年,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附属和补充”。^{[1](p.211)} 1980年10月,《国务院关于开展和保护社会主义竞争的暂行规定》明确了支持和保护个体经济的政策方向。^[2] 1980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切实保障“个体劳动者的合理利益”。^{[1](p.636)} 1982年,十二大提出了“两个决不允许”的政策方向:“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我国经济的基本制度,决不允许破坏”;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决不允许任何方面对它们排挤和打击”。^{[3](pp.17-18)} 1987年,十三大第一次从理论和政策上破除了发展私营经济的禁锢,提出私营经济“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4](pp.31-32)}

1979年至1987年的一系列重要文献表明,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渐进—坚定—彻底地否定了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对个体私营经济“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左”的做法和政策方向。

1992年十四大以来,人类历史上社会主义所有制经济从“一大二公三纯”的传统模式向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创新模式转变的历史进程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悄然启动了。历经1997年十五大、2002年十六大、2007年十七大、2012年十八大,中国共产党关于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理论和政策,逐步形成、发展和完善,并且成为指导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重要理论和政策依据。

一、初步提出“财产混合所有的经济单位”这一模糊概念

1992年,十四大提出:“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不同经济成分还可以自愿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5](p.19)} 这里第一次明确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之间可以实行联合经营的政策方向,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传统所有制理论的重大突破,颠覆了公有化规模越大越好、国有化程度越高越好、公有制成分越纯越好(“一大二公三纯”)的传统观念,为跨所有制的联营、并购、重组破除了思想禁锢。

以十四大提出的跨所有制联合经营的理

作者:冷兆松,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论和政策为指导,党中央客观而大胆地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在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初步提出“财产混合所有的经济单位”这样一个新概念。“决定”指出:在积极促进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发展的同时,鼓励个体、私营、外资经济发展,随着产权的流动和重组,“财产混合所有的经济单位越来越多,将会形成新的财产所有结构”。^{[5](p.526)}

“财产混合所有的经济单位”,实际上就是指混合所有制经济的企业。这里的“混合”,是否可以是国企、集体、个体、私营、外资之间的混合,或者说是否可以是有资本(资产)与私有资本(资产)之间的混合,既没有明确肯定,也没有明确否定。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财产混合所有的经济单位”这个模糊概念的提出,为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取向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政策创新开辟了丰富的想象空间,为“混合所有制经济”概念的提出提供了直接思想来源。

二、第一次提出和界定 “混合所有制经济”概念

在中央文献中,1997年十五大报告第一次提出和使用“混合所有制经济”这个新概念。“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6](p.21)}这里的“混合”,是指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这样的公有资本(资产)与其他非公有资本(资产)之间的混合。这层含义,尽管在十五大报告中没有展开阐发,但是在上下文的联系中已经被确切地锁定了。^{[6](p.21)}这就比“财产混合所有的经济单位”这个模糊概念,更加明确。

当然,这个时候,还只是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经济这样一个理念,没有形成界定清晰、定义完备的概念,没有作出理论阐发,没有作出政策决策,没有配套政策措施。

1999年,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一次初步阐发了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思想,第一次明确了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的决策。“国有大中型企业尤其是优势企业,宜于实行股份制的,要通过规范上市、中外合资和企业互相参股等形式,改为股份制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7](p.1009)}

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一次对“混合所有制经济”给予明确界定,即“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8](p.466)}简单地说,就是用“三个参股”定义“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概念(简称“2003年版定义”)。

这个初步界定的概念,沿用了10年时间。

三、“混合所有制经济” 概念的发展完善

真可谓“十年磨一剑,一朝试锋芒”,经过10年的理论和实践探索,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三个方面发展、完善和创新了“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概念:“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9](p.515)}(简称“2013年版定义”)

这个定义,与2003年版定义有一个共同点,即“混合”的对象是相同的,都是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之间的混合。不同之处是,与2003年版定义相比较,2013年版定义实现了“一个完善”和“两个创新”。

第一,2013年版定义以“交叉持股、相互融合”替代2003年版定义的“参股”,这就更加完善更加丰富地表达了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相互之间“混合”的广度、深度和力度,弥补了2003年版定义比较笼统的不足。

第二,2013年版定义实现的第一个重大创新是,提出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从提出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到提出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这是一个重大

理论创新和决策创新。这是我们党认真总结改革开放 35 年来的实践经验获得的重大理论突破,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和基本经济制度认识不断深化的重大认识成果,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内涵的重大丰富和发展。

第三,2013 年版定义实现的第二个重大创新是,以“两个有利于”厘清了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功能和作用。混合所有制经济“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这是我们党第一次对混合所有制经济本身的功能作出明确定位,是混合所有制经济理论的新发展。

四、“混合所有制经济” 概念的核心内涵

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这个新论断,准确揭示了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核心内涵。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6](p.808)}混合所有制经济,既已被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确定为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也必定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重要实现形式。由此看来,混合所有制经济既是公有制经济的重要实现形式,又是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实现形式。

基本经济制度是内容,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二者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内容决定形式,形式服从内容。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方向、发展形式、发展结果,必须服务于服从于基本经济制度的性质。

由于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性质属于社会主义,因此,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必须有利于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巩固,有利于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发挥,而不是相反。这一点尤为重要和关键,因为公有制经济在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中处于生死攸关的主体地位,国有经济又在公

有制经济中处于举足轻重的主导地位。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任何政策措施,必须有利于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而不是相反。有人建议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规定,主张在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过程中淡化甚至否定公有制主体地位,有人试图借助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途径搞“国退民进”、搞私有化。这些都是对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战略意图的严重歪曲。

五、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 改革的方向和目标

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战略决策之后,一些新自由主义者借机宣扬,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就是要大力推进私有化,让更多私企、外企控股国企,让更多国企退出竞争性领域等错误论调,制造思想混乱。

从我们党关于“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定义及其核心内涵可以看出,国企混改的方向绝不是削弱国有经济,不是削弱公有制经济,更不是私有化。习近平对这个重大的根本性问题高度重视,反复强调。

2014 年 3 月,习近平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安徽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基本政策已明确,关键是细则,成败也在细则。要吸取过去国企改革的经验教训,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谋取暴利的机会。在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指出,国企不仅不能削弱,而且要加强。^[10]2014 年 8 月,习近平在中央深改组第 4 次会议上指出,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管理企业,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主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据支配地位,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在我们党执政和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中也是起支柱作用的,必须搞好。中央企业负责同志肩负着搞好国有企业、壮大国有经济的使命。^[11]2015 年 7 月,习近平在吉林调研时指出:我们要向全社会发出明确信息:搞好经济、搞好企业、搞好国有企业。国有企业

是推进现代化、保障人民公共利益的重要力量,要坚持国有企业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不动摇,坚持把国有企业搞好、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优不动摇。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要有利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12]习近平关于国企改革“三个有利于”的重要论断,在理论上丰富了我们党关于“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内涵,在实践上是保障国企混改方向的指南。

2013年8月,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13]国企混改的成败,就是这样一个关乎中国全局的根本性问题。从国内经济结构和经济基础的现实状况看,国有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要力量和根本基石。从国际竞争力看,国有企业是跻身世界500强的主力军,在国际市场上能与西方跨国公司抗衡的主要是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2015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指出:“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公共利益的重要力量,是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面向未来……在推动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国有企业肩负着重大历史使命和责任。”^[14]国企私有化论调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摧毁我们党执政的经济基础,就是要摧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经济基础,所以,绝不能允许有人打着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幌子搞“国退民进”、搞私有化。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得到了明确重申。国有企业改革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把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作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把握的根本要求,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积极促进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

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14]《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还明确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主要目标。到2020年,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基本完成,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取得积极进展。^[14]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2]国务院关于开展和保护社会主义竞争的暂行规定[EB/OL].
http://www.nmfzw.com.cn/news_show.asp?id=14518.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10]习近平谈所有制改革:国企民企“合”得来才能“混”得好[EB/OL].http://www.ce.cn/xwzx/gnsz/szyw/201408/19/t20140819_3382163.shtml.

[11]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EB/OL].http://www.gov.cn/xinwen/2014-08/18/content_2736451.htm.

[12]习近平在吉林调研时强调 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发展自信[EB/OL].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7/18/c_1115967338.htm.

[13]郑永年.中国十大可能的“颠覆性错误”[EB/OL].http://www.qstheory.cn/politics/2015-02/28/c_1114469360.htm.

[14]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EB/OL].<http://news.sohu.com/20150913/n421018689.shtml>.

责任编辑:美景

The Development of “Mixed Ownership Economy” and Its Nuclear Connotation: Under three-decade continual practices since the 3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1th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the theories and policies for developing “mixed ownership economy” have been taking shape and constantly been improving. In 1993, the renewing theory of “economic units with mixed ownership of assets” was put forward on the 3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1th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ensuring space for theoretical, practical and policy innovation in developing mixed ownership economy. In 1995, the report of the 15th NCCPC proposed for the first time the notion of “mixed ownership economy”. And the theory was further improved, calibrated and renovated on the 3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8th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in 2013, which unveiled its nuclear connotation and the prospect of mixed ownership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 publication of *A Guidance of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2015 clarified the goals of mixed ownership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Leng Zhao-song)

The Path from a Large Trading Country to a Trading Power: It was the influx of foreign capital that made China a large trading country in light of the status quo that mobility of production factors all over the world defines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among countries in global economy. Therefore, the profit of production factors in China is bound to be relatively low. Intent on building up a trading power, we should transform from introducing factors to cultivating them, from the low-end to the high-end in the value chain, and from environment adaptation to institutions construction. The theoretical issues involved in the transformation include analytical method for trade income, comparative methods for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pathway for upgrading value chain specialization, the role in 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 and balance between domestic and foreign strategies, etc. The present mechanism and recognized rules that global economy follows is microcosmically based on the global mobility of production factors. For this reason, we should further advance th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put forward the strategy for altering China’s status in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constructing a trading power, and define China’s development route so as to enrich economic theories.(Zhang You-wen)

Socialist Literature and Art Are People-Serving: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Historical Logic of CPC’s Philosophy on Literature and Art: Literature and art of any kinds are bound to be the products of their specific times, taking the certain tasks of the age as their main tasks and fundamental basis. It is not only an inevitable rul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but also an ultimate principle that we follow for pinning down the pathway and making policies for literature and art. Acknowledging the modernity of literature and art is to accept their basic goals and fundamental pathway conform to the times. On the one hand, there are unchanged contents in CPC’s philosophy on literature and art, which dominate CPC’s philosophy on literature and art.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remain other parts changeable with times and forming no contradiction to the dominant tune and gist in CPC’s philosophy on literature and art. Even the people-servingness as the main logic of socialist literature and art has presented various connotations in different times and its evolution constitutes the intrinsic development of CPC’s philosophy on literature and art(Lian Ying)

On Theories and Practices for Constructing a Socialist Country with Powerful Cultural Advantages Since the Eighte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Steadily advancing socialist construction with powerful cultural advantages was made a significant part in the overall layout for “Five-in-one” on the Eighteenth CPC Congress. The new central leaders collectively push forward clarifying the goal and pathway towards a socialist country with powerful cultural advantages, building up service system for modern mass culture, and advancing the standardization and equalization of fundamental mass culture service. Efforts are also made to plan and balanc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s and resources, to push forward rapid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dustry, and to cultivate and practice socialist core values for strengthening the socialist foundation and stressing the basic role of the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 contemporary cultural construction. We should actively further the publicity of Chinese culture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diversified neo-eco system. Meanwhile, proper significance should be paid to the active roles of culture as it may uphold a spiritual banner, set up a spiritual pillar, and construct a spiritual homeland on the one hand; and carry forward Chinese virtues, disseminate Chinese values and cohere Chinese strength on the other hand. And we should theoretically and practically expand the scope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a full sense, presenting a whole new character and atmosphere, and taking a solid step in socialist cultural developmen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Ouyang Xue-mei)

An Analysis of Advancing Equal Distribution in Enterpri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Ethics in the Private Sect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ethics, the equal distribution of income in private enterprises refers to the fair distribution of gains in line with contribution to production factors which follows socially recognized moral rules and criteria as well as represents the co-sharing of whole staff members involved. It includes the appropriateness of income resources, the rationality of distribution rules and the justice of ultimate distribution. However, private enterprises’ obsession with maximized profits often distorts the principle of equal distribution and handicaps the compilation and practice of equal distribution rules, which leads to an excessive gap between labor and capital and seriously deviates the goal of justice and common prosperity. Equal distribution would not come into being unless private-owned enterprises decide to choose and develop a sense of fairness as well as an internal system of fair distribution under the restraint of governmental supervision.(Qiao Gui-xiang)

On a Long-Term Mechanism for Cultivating Social Creditability: A Positive Analysis of Different Groups: Social creditability belongs to a fundamental moral domain which gradually takes its shape after human society develops into a classed one. From a deep structure of ideology, the concept of honesty is a predominant value accepted as moral consciousness by the majority of Chinese. The notion not only impose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Chinese moral domain and figures, but also has cohered to become a fundamental symbol and core element for moral concepts in Chinese society. Since the opening up, the current social creditability are confronted with severe challenges attributable to social,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factors. By questionnaires and interviews with workers, peasants, civil servants and undergraduates, we attempt to map out a long-term mechanism for cultivating social creditability which covers government-directed mechanism, guarantee mechanism, network operation mechanism, mechanism of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nd transformative practice mechanism so as to propel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ocial creditability.(Hu Xue-yan and Yin-Jie)

On Social Morality in the Course of Modernization: A Market- and Cyber- Oriented Perspective: Since the end of Qing